

国家工业建设中的女性记忆 ——以大庆石油会战家属为中心

黄水勃

黑龙江科技大学,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DOI:10.61369/HASS.2026030009

摘 要 : 本文以大庆石油会战家属为对象,考察其由家庭成员转化为“家属工”的身份建构,以及劳动承担、家庭照料与日常再生产交织而成的经验结构。会战家属是国家工业建设基层运转的重要承担者,其晚年叙事通过重组劳动与家庭经验,实现了对自身历史位置的确认,并揭示了国家工业建设赖以维持的社会基础及其性别化承担方式,同时呈现出个体生命史向公共历史转化的叙事机制。

关 键 词 : 国家工业建设; 会战家属; 女性记忆

Women's Memory in National Industrial Construction— A Study of the Family-Workers of the Daqing Petroleum Campaign

Huang Shuibō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01

Abstract : Focusing on the Daqing Petroleum Campaign Family-workers,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identity formation through which family members were transformed into “family-workers,” as well as the experiential structure shaped by the interweaving of labor, family care, and everyday reproduction. As important bearers of grassroots operation in national industrial construction, the Daqing Petroleum Campaign Family-workers sustained both the productive and reproductive dimensions of the campaign. Through the reorganization of labor and family experience in later-life narratives, they confirmed their own historical position, revealed the social foundations and gendered forms of support underlying national industrial construction, and demonstrated the narrative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individual life histories were translated into public history.

Keywords : national industrial construction; daqing petroleum campaign family-workers; women's memory

一、问题提出

大庆石油会战长期被置于国家工业建设、资源开发和时代精神的叙述框架中加以理解,相关研究因而多集中于生产成就、组织动员及其历史意义。与之相比,会战家属虽频繁出现在会战历史的边缘叙述中,却较少被作为独立对象展开分析,对其身份形成、劳动配置、家庭责任及记忆叙事的讨论仍显不足。研究对象的缺位,使国家工业建设的社会基础长期停留在宏观层面,难以进入具体的生活过程和经验层面。

会战家属进入会战秩序,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家庭随迁,而是组织安置、制度管理与劳动配置共同作用的结果。会战家属既被纳入生产与生活保障体系,又承担家庭维系与照料责任,其经验位于劳动结构与家庭结构的交叉点。正因如此,会战家属的口述记忆能够将国家建设、制度安排与日常生活重新连接起来。本文关注三个问题:会战家属的身份如何被建构并嵌入制度体系;劳动与家庭交错的经验何以成为其记忆叙事的核心内容;晚年回望又如何重组这些经验的意义,并完成对自身位置的再理解。本文将其作为独立分析对象,通过其劳动承担、家庭责任与晚年叙

事,进入国家工业建设赖以维持的社会基础层。

二、会战家属的身份建构与制度嵌入

费孝通先生指出社会学的人文转向,“社会学是一种具有‘科学’和‘人文’双重性格的学科,人的社会性与生物性互相兼容互相结合除对‘社会’的研究之外,我们还应该深入到对‘人’的理解中去。”^[1]会战家属的形成,本质上是国家建设任务向家庭领域延伸并经由组织机制完成整合的过程。婚姻关系构成其进入会战网络的前提,管理体系和劳动配置则赋予其明确的制度位置。就此而言,“家属工”并非家庭身份的自然延伸,而是在国家任务、组织管理与家庭迁移共同作用下被建构出来的历史类别。

这一身份建构至少包含两层机制。其一,家庭迁移被纳入会战秩序,私人生活由此进入国家建设的组织化空间;其二,女性被配置进生产辅助与生活保障体系,家庭成员身份被进一步转化为劳动身份。身份建构与制度嵌入由此同步完成:会战家属既是家庭关系中的妻子与母亲,也是会战秩序中的劳动承担者。会战家属在1961年被正式纳入管理体系,成为“家属工”,并承担农

作者简介:黄水勃(1988.02-),女,满族,黑龙江哈尔滨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基层治理/记忆社会学。

副产品供应及相关辅助劳动。会战家属由此不仅是特定时期的劳动身份，同时是观察国家建设如何通过组织机制进入家庭生活、并重新界定女性社会位置的重要切口。

三、劳动一家庭结构中的女性经验与记忆实践

大庆石油会战在新中国工业建设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是新中国时代精神的生动写照。^[2]家属的日常经验生成于生产劳动与家庭再生产相互交织的生活结构。作为被纳入家属工管理的女性群体，会战家属长期处于组织劳动与家庭责任并置的处境之中。生产辅助、生活保障、家庭照料与子女抚育，构成其日常生活的核心内容。晚年叙事亦主要围绕这些持续性的责任实践展开。劳动一家庭结构因此不仅塑造会战家属的现实处境，而且规定其记忆叙述的基本内容。

（一）生产辅助与生活保障中的女性劳动

单位是我国一种特殊组织，在计划经济时代发挥重要作用，单位的功能不限于社会控制、专业分工与资源分配等。^[3]会战家属取得家属工资格后，主要在集体企业及相关岗位承担农副产品供应、生产辅助与生活保障工作。参与的劳动虽不处于采油、钻井等核心生产环节，却构成生活资料供给、后勤维持与基层秩序延续的基础条件。石油会战的持续推进，除依赖核心生产劳动外，还依赖围绕生产现场展开的再生产机制。会战家属承担的体力劳动与辅助性劳动，正属于这一基础层面，其历史意义应在国家工业建设整体运行机制中加以把握。

家属工劳动的制度意义，在于女性经由统一管理、岗位安置与劳动分派，被纳入会战基层运转体系，承担生产辅助、生活保障和物资供给等职责。由婚姻关系界定的家庭成员，由此转化为与生产生活秩序直接关联的劳动承担者。其核心不在身份名称的变化，而在于女性位置的制度化重构及家庭生活对会战体系的组织性嵌入。

劳动经验在晚年叙事中的突出位置，同样具有明确的社会含义。会战家属反复讲述劳动经历，并以“自豪”“能干”“顶得上”等方式评价自身，其核心不在情绪表达本身，而在于劳动提供进入国家建设过程的现实路径。持续性的身体投入和责任承担，使个人生命历程获得与会战历史相连接的坐标。劳动记忆由此保存国家工业建设中较少被宏大叙事展开的基础劳动层，同时成为会战家属确认自身作用与历史位置的重要经验依据。

（二）家庭照料与日常生活的再生产

一种由社会界定的并带有同龄标志的事件和角色模式，它受到文化和社会结构变迁的影响。^[4]家属工劳动之外，会战家属所承担的家庭照料与日常维系，构成石油会战持续运转的再生产基础。高强度会战劳动并不只以井场、车间中的直接生产为前提，还以家庭内部照料责任、生活安排与关系维护的稳定承担为条件。丈夫长期处于高强度劳动状态，子女抚育、家务管理、日常供给与情绪安顿等事务，因而主要由会战家属承担。家庭由此不再只是游离于国家建设之外的私人空间，而成为生产秩序得以在基层社会层面延续的生活支撑结构；家庭照料亦不宜被理解为单纯的私人伦理实践，而应被视为国家工业建设得以维持的日常再生产机制。

会战家属的记忆建构，本质上是一种经验筛选与意义提炼过

程。“鲜活的记忆将会让位于一种由媒介支撑的记忆，这种记忆有赖于像纪念碑、纪念场所、博物馆和档案馆等物质的载体。”^[5]真正被反复讲述的，往往是那些在长期生活中持续发生、同时承载责任和情感投入的内容。劳动是会战家属获得进入国家建设过程的现实路径；家庭维系之所以占据稳定位置，则在于它构成会战生活得以维持的日常基础。二者共同作用，使会战家属对过去的回望并不局限于事件回忆，而是围绕“承担什么”“支撑什么”“在其中处于什么位置”展开。记忆成为解释自身生命经验的重要方式。

晚年叙事是经验意义的重新组织，并进一步凝聚为关于奉献、承受、支撑与能干的叙事线索。其关键不在于过去经历被再次讲述，而在于叙述主体据此重新理解自身在会战生活中的位置。经由对劳动经历和家庭责任的持续讲述，会战家属逐步摆脱单纯由婚姻关系界定的“家属”位置，形成对自身作为会战生活实际承担者的历史表述。不仅重组个人经验，也完成对自身历史位置的再次确认。

（三）劳动一家庭交织中的记忆建构与叙事重构

会战家属的记忆并不沿着劳动经历与家庭经历两条彼此分离的线索展开，而是在二者持续交织的生活结构中逐步形成。进入晚年之后，被反复讲述的内容，通常不是抽象化的时代口号，也不是单一事件的简单回放，而是围绕劳动承担、家庭维系、关系协调和责任分配等经验展开的叙事组织。记忆之所以在这些层面上稳定聚集，原因并不复杂：劳动与家庭责任构成会战家属生命历程中最具持续性、强度和密度的经验结构，它们决定什么最值得被保存，什么最容易在回忆中重新浮现。

会战家属的记忆建构，本质上是一种经验筛选与意义提炼过程。并非所有经历都以同样方式进入晚年叙事，真正被反复讲述的，往往是那些在长期生活中持续发生、同时承载责任和情感投入的内容。劳动之所以被不断提起，是因为它使会战家属获得进入国家建设过程的现实路径；家庭维系之所以占据稳定位置，则在于它构成会战生活得以维持的日常基础。二者共同作用，使会战家属对过去的回望并不局限于事件回忆，而是围绕“承担什么”“支撑什么”“在其中处于什么位置”展开。记忆由此超出单纯保存事实的层面，而成为解释自身生命经验的重要方式。

晚年叙事中的意义重构，主要体现在对过去经历的重新命名与重新评价上。原本分散于劳动、持家、照料、分担和关系维持中的具体经验，在回忆中被重新组织为关于奉献、能干、承受与支撑的叙事线索。对于感兴趣的内容记忆深刻，引起情绪变化的经历使人们难以忘怀。^[6]会战家属借由对劳动经历和家庭责任的讲述，将自身从“会战家属”这一关系性称谓中进一步推出，转化为“会战生活实际承担者”的叙事主体。晚年叙事并不只是对既往生活的追述，而是对自身历史位置的再次确认。劳动一家庭交织中的记忆建构与叙事重构，最终使会战家属得以将个人生命历程嵌入国家工业建设的历史进程之中，并赋予自身经验以稳定而清晰的意义形式。

四、晚年叙事中的意义生产与主体呈现

记忆不是一个复制的问题，而是一个建构的问题。^[7]晚年叙事是对既往经验的再解释。分散于劳动承担、家庭维系、照料实践

与关系协调中的日常经历，在回忆过程中被重新归类，并被赋予更高强度的价值指向。原本以事务形态存在的生产辅助、持家、抚育、分担和支撑，在晚年叙述中逐步凝聚为“能干”“承受”“奉献”“顶得上”等具有评价意义的意义单元。这里发生变化的，不是经验事实本身，而是经验的解释框架。会战家属对过去的回顾，由此超出生活细节的保存，进入对个人经历之社会分量的重新衡量。劳动与家庭责任之所以在回忆中占据突出位置，正在于这类经验持续时间长、责任密度高，并与“自豪”“矛盾”“恐惧”等强烈情感记忆相互交织。

记忆既不断繁衍又不断删减，既是集体，多元的，又是个体化的。记忆根植于具象之中，如空间、行为、形象和器物，记忆是绝对和纯粹的。^[6]在这一再解释过程中，晚年叙事进一步承担位置确认的功能。会战家属在叙述中不再满足于停留在由婚姻关系所界定的“家属”位置，而是经由对劳动经历和家庭责任的持续讲述，将自身表述为会战生活的实际承担者、维系者和支撑者。这里所呈现的主体性，并非抽象意义上的个体自觉，而是通过具体经验的重新排列所形成的历史自我认知：个体何以进入会战生活，何以在其中承担责任，又何以在回忆中确认自身作用。关于“自豪感”“清晰定位”以及“姐妹情谊”的叙述，都说明主体呈现并不依赖脱离关系网络的独立宣告，相反，它恰恰生成于共同劳动、单位社区和女性互助所构成的群体坐标之中。主体的形成，因此并不以摆脱关系为前提，而以对自身在关系结构中所处位置的重新界定为条件。

哈布瓦赫指出“每个人物和每个历史史实在进入这个记忆中时变成一个学说、一个概念、一个象征；它包含了一个意义，变成了社会理念系统中的一个成分。”^[9]晚年叙事还将个人经历推进为一种历史化表达。会战家属所回忆的，并非与时代无涉的私人往事；经由持续讲述，劳动承担、家庭照料与共同生活经验被纳入“会战”“建设”“那个年代”的历史框架，个人生命史由此获得公共叙述的尺度。回忆不再仅仅服务于个体自我安置，而成为将个人经历嵌入国家工业建设历史进程的表达方式。正是在这一层面上，会战家属的口述记忆补足宏大工业叙事较少展开的社会基础层：国家工业建设并非仅由生产现场中的核心劳动构成，

还由家庭内部的照料责任、基层生活的持续维持以及女性对共同生活秩序的长期支撑共同完成。晚年叙事对这些经验的历史化处理，使会战家属得以在会战记忆中占据可被辨认的历史位置，也使女性记忆成为理解国家工业建设社会基础的重要入口。

五、结语

集体记忆成为了发达社会与发展中社会、主流阶层与非主流阶层为权力、生活、生存、发展而激烈争夺的一部分。^[10]会战家属的口述记忆并非仅为大庆石油会战提供若干生活细节的补充材料，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揭示国家工业建设赖以运转的社会基础。既有关于会战的叙述多围绕生产体系、组织动员与时代精神展开，本文则进一步指出，国家工业建设的历史实践并不止于生产现场中的核心劳动，而是同时建立在家庭照料、生活维系、关系支撑与基层再生产等日常机制之上。会战家属的晚年叙事，正是通过对劳动承担、家庭责任和共同生活秩序的持续讲述，使这些长期处于宏大叙事之外的经验层获得历史可见性。由此，女性记忆的研究价值，不仅在于保存个体生命史，更在于将国家工业建设中的性别化分工、日常再生产机制及其基层社会支撑结构带回分析中心。由此，对会战家属的讨论指向一个更具解释力的问题：国家工业建设如何通过基层劳动、家庭照料与日常再生产获得持续性支撑，以及这种支撑如何在晚年记忆中被重新讲述和历史化。

本文对会战家属记忆的讨论，提示国家工业建设研究有必要从生产史、精神史和制度史的既有框架，向社会基础、日常运行与性别承担的分析维度展开。后续研究可在三个方向上继续推进：其一，将会战家属与正式职工、其他工业建设场景中的女性群体进行比较，考察不同制度位置下女性经验的差异及其记忆表达；其二，围绕口述记忆的代际传递与历史转化，分析会战经验如何由个人叙述进入地方记忆、单位传统与公共历史叙述；其三，将女性劳动、家庭再生产与国家建设之间的关系纳入更具解释力的分析框架，从而深化对新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社会基础、性别秩序与历史主体的理解。

参考文献

- [1] 费孝通. 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 [J]. 思想战线, 2004 (5).
- [2] 祁正. 新中国工业建设的个人记忆——以大庆石油会战为例 [J]. 贵州社会科学, 2021 (11).
- [3] 李路路. “单位制”的变迁与研究 [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3(1).
- [4] [法] 皮埃尔·诺拉. 记忆之场 [M]. 黄艳红等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1.
- [5] [德] 阿莱达·阿斯曼. 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 [M]. 潘璐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 [6] [法] 莫里斯·哈布瓦赫. 论集体记忆 [M]. 毕然、郭金华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 [7] [美] 保罗·康纳顿. 社会如何记忆 [M]. 纳日碧力戈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 [8] [德] 扬·阿斯曼. 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会议和政治身份 [M]. 金寿福、黄晓晨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 [9] [美] 格伦·埃尔德. 大萧条的孩子们 [M]. 田禾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2.
- [10] [法] 雅克·勒高夫. 历史与记忆 [M]. 方仁杰、倪复生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